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且决定朱德同志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同志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提出建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党性坚强，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到纪委工作。朱德同志自以己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反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朱德同志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一直是认真严肃的。在我们党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现在认真整党肃风，严防死守，以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认真贯彻落实的时候，我重温了朱德同志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两次讲话，受到了很深的教益。时间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但这两次讲话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德同志在一九五〇年五月的一次讲话（见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中，首先讲到要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来“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更好地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或倾向”。他要求“每个参加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地检查了解：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违犯党章、党纪、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法令及政策，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和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朱德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极其重要的。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正确贯彻执行，是关系党、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因此，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正确贯彻执行，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正如朱德同志所说：“这一工作作好了，他们就能起保证作用，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就能成为在贯彻政策、实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如果这项任务完成得不好，其他方面即使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不能说是完成了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是正确的，但在贯彻执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少数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由

整顿党风

——重温朱德同志的两次讲话

王从吾

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贯彻执行起来就不认真，很不得力；特别是那些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他们是党的隐患，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他们用种种办法来抵制、反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绝不能麻痹，否则就会使党的事业遭受灾难。各级纪委发现后，必须及时向上级反映，认真解决。

朱德同志在同一次讲话中，严肃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他讲到：“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同志对工作极端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们“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或不大负责任的态度”。朱德同志指出，对这种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罪恶行为。凡是有这种态度有这种作风的同志，如果不痛加改正，就不能取得党、国家和人民的原谅”。由于官僚主义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它随时都可以找到赖以生存的土壤。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破坏，使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更艰巨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有的同志不调查新情况，不研究新问题，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对上级指示只知照抄照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执行；有的对业务知识不学习，安于当外行，不尊重科学，不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搞瞎指挥；有的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搞特殊化，不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对坏人坏事不公开斗争，听之任之，对人民疾苦熟视无睹；有的不公正执法，只图圆不拍板，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效率很低，贻误工作。如不克服官僚主义，我们的党就会严重脱离群众。

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首先是进行教育，使他改正。但是，对那些由于严重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纪律检查部门必须认真检查，不管问题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应该查明情况，选择典型，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这是纪律检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五五年五月，在董必武、刘澜涛、钱瑛等老同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朱德同志作了语重心长的

讲话，他殷切地希望今后“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他曾对某些以功臣自居，特权思想严重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严肃地警告这些同志：“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你们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失去了和革命同伴继续前进的机会。”他还批评：“有些人没有认识到纪律的重要，认为党的纪律只是给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更有些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政府算什么，管不着我这个老党员；法律也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我可以不遵守。所有这些，都是剥削者的思想和行为。而 these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却是一种耻辱！”在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严重破坏的今天，重温朱德同志这一教诲，使我们倍感亲切。

大家知道，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各级主要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受了党和人民的委托，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的兴亡成败，关系重大。因此，干部的职责越高，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和监督就越要严格。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纠正和防止某些高级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曾发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五中全会后，又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印发了准备提交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严格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以此为镜子，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事能当表率，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执行。同时，各级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定期检查，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这样，少数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纪律废弛的现象是能够克服的，党风是能够逐步搞好的。

朱德同志在一九五五年的讲话中，还提出了“检查和处理案件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关怀同志的政治生命，防止错误的处分；既要反对照顾情面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要反对滥用职权和粗

大叶的作风。”朱德同志的意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检查处理案件时，一定要坚持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所谓严肃，按朱德同志的话来说，主要是“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他违犯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要去检查他，纠正他。”所谓慎重，就是不要“轻易地提出和处理别人的问题，提出和处理别人的问题时，一定要有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按照这个方针去做的，平时检查处理的大量案件，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处理的案件，错误就不少。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受了“左”的思想的影响，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或者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定性偏高；一是粗枝大叶，没有把作为处理根据的事实认真弄清楚，做到准确无误。这两点，都违背了严肃慎重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引以为教训。今后我们检查处理和实行案件，都要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按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办事，做到弄清事实，定性准确，手续完备，处理恰当。

朱德同志在一九五五年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各级监察专职干部的理论教育、政策教育、业务教育的工作，以便有效地提高他们在履行职责任务时的工作水平。”朱德同志的这一意见，固然是对我们纪律检查工作干部的关怀，但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出了认真学习任务的。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每一个纪律检查工作者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在学习中，要刻苦钻研，善于联系实际，接受别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随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当前，我们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党要完成四化建设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而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健全党规党纪，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此，我们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当好党的助手，负责检查监督，以保证《准则》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我们要同败坏党风和违犯党纪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一定要不辜负党中央和广大党员与人民的期望，不辜负朱德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



须待历史证明的话

——在哀悼父亲安子文的时刻所想到的

安黎 小鲁 安国 德平

当父亲的旧装已经成为遗物，他的照片也已变为遗像的时候，我们清楚地记得，父亲病危那几天，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可是，他那颤动的双唇，满怀心事的目光，显示出他在离去之前，还有很多的活要说，仍然想将最后的叮嘱和期望尽量地倾吐出来……

父亲的一生是我革命的一生。他在少年时期就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光荣的成员。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二十年的光阴是在囚禁中度过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当父亲刚刚开始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四化奋力前进的时候，却一病不起！

一生战斗不息，父亲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今天，我们在无比悲痛中默想，父亲一生的言行中，有哪些最宝贵的东西，将使我们永志不忘？

一

过去同父亲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父亲一向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即使在囚禁中，他也顽强地战斗，任何威逼和利诱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动摇。

1975年上半年，全国局势从长期混乱中出现了一线光明。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六十一人”案已“重新定讞”，对父亲这样的人要监禁终身。8月，我们兄弟中有人到过父亲的管制地——淮南。他头一回谈到对专案人员对他诱供、逼供的令人愤慨的情况。

1967年4月，父亲已被“隔离反省”半年多了，专案办公室某负责人忽然亲自找他谈话。这人对我说：“现在有些件头等着你！只要你能够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成为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停在门口。”父亲问：“这位中央首长是谁就是康生？”这人答：“是。”父亲清楚地告诉这人，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是叛徒，断然拒绝为他们制造伪证。

1968年1月，父亲被投入监狱。不久，这个专案负责人又来到监狱继续诱供。他对父亲说：“头功已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功也有很大的好处。”并且说：“你难道不愿同自己的老妻孩子见面吗？”父亲说：“我不仅想同亲人见面，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这时，这人又历数

了刘少奇的四次“叛变”经过。父亲鄙视地对他 说：“你既然都知道，你就自己写吧！”

专案人员诱供之心未死。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这人又亲自来京报告“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如果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能亏待你。组织部长嘛，是做不成，中央委员还可以有你的。”父亲明确地对他说：“以后再不要问这件事了。”这人仍然缠着要父亲考虑，并且给一个“最后的希望”。父亲再一次正严地拒绝了他：“不用了，我不知道！”

三次诱供都失败了，他们就使用暴力逼供。父亲从容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父亲就是这样临难不苟，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二

在父亲的全部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做党的组织工作。我们听老一辈的同志谈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父亲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锻炼出一种识别人、观察人的特别能力。他善于接近人、了解人，善于细致地做人的工作。他熟悉干部，知人善任，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而是他真正理解党的干部对于实现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此，他把全部心血都灌注到本职工作上去。

父亲在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向来反对对干部实行惩办主义，能够实事求是地辩证地分析干部的成绩和错误，对干部既有严格的督促和要求，又不求全责备，一味批评。在1951年政务院人事部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应该从干部的基本方面去看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一个人不能不犯错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犯错误，做错事。拿个日记本，把每天说的话、错事都记录下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把三百六十五天的错误都集中起来，那么任何一个干部都会被搞成‘反革命’，这就叫一棍子打死，这是错误的政策。”这句简单的话，告诉了我们一个平凡而重要的道理：

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害怕错误，而且党组织应该创造一种环境，保护和鼓励那些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同志，俾使每个人都勤于反省，进行自我批评，乐于接受同志们的检查和监督。

父亲这种态度，使他收到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处，就是干部群众都愿对他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这就使他能脚踏实地进行

工作。做错了的事，错误及时予以纠正，不恰当地地提拔了的干部，能及时予以干部。父亲曾经在庐山会议上不正确地参加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他在1960年听取安徽、河南两省生活极苦大苦难的汇报时，他和周围的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痛悔的眼泪，并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父亲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这种阶级感情，首先来自他对他党的热爱，对人民事业的热爱，也来自革命前辈的教育和影响。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1928年初，河南省委被破坏后，父亲也被捕了。一天，牢房里忽然抬进一个用破被裹着的“犯人”。父亲一看这个人因受刑过重，全身血肉模糊，就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故人的凶残激起他无比的愤恨，也增添了他对这位不知名的同志的友爱之情。他坚持每天给这位同志擦洗伤口，端屎端尿，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顾，这位同志的伤势逐步好转了。后来知道这位同志就是任作民同志。

当时，父亲才十几岁。这位革命前辈在狱中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对年轻同志的关怀和教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我们表示对这位先辈的怀念之情。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把大批党的重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父亲的心无时无刻不是随着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遭受的迫害和折磨而忧虑和痛苦。

在淮南，父亲总是不断地询问许许多多干部的情况，有时夜里也睡不着，一直同我们谈到凌晨。他为一一些人恢复了工作而宽慰，为一些人被迫害致死，或者仍然同他们一样被凌辱而悲愤，也为一些人作了，追随“四人帮”去了而惋惜，并且希望他们能早日幡然悔悟。

父亲多次向我们打听董边同志的情况，我们说不幸逝世，他就向我们讲述田家英同志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董边同志是田家英同志的爱人，她心也会被害。去年5月，父亲在医院里又问我们，为什么在报上没有看到给田家英同志平反的消息（后来田家英同志也平反了）？让我们去找找董边同志，问她向董边上反映过田家英同志的事情没有，如果没有反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他认为，无论何田家英同志的问题应该解决了。

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口是心非。为了诬蔑父亲一人，他们竟至否定整个中央组织部，甚至否定二十多年来党的组织路线，荒唐悖谬，真是天下少有！这些家伙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伪造历

史，已经受到历史的惩罚。最近，中央决定，为1966年以前的中央组织部恢复名誉，为一切受过株连的同志全部平反。中央组织部的真实情况终于大白于天下。

三

父亲逝世前二十多天，忽然紧紧地握着小孙女的无，无限情深地说：“毛毛，咱们回淮南好不好？”淮南，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本是父亲足迹从未涉及的地方。在江青、康生一伙看来，这种地方正是给父亲划地为牢，使他与人民隔绝的放逐地。于是他们在1975年5月，把父亲流放到这里。父亲在这里虽然过的是被管制的生活，但是，他却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父亲重病卧床的时候，他把深深的思念寄向自己生活了三年零七个月的淮南，寄向这块土地上他所热爱的、曾经朝夕相处的淮南人民。

在舜耕山下、淮河之滨，父亲结识了许多党的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人们尊敬他，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他们向父亲倾诉对真理的渴求，希望听到他讲述党的真实历史，要求他解释当时各项工作调整的方针、政策。父亲很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担心他们遇到的困难、解放后，父亲从未有机会这样长时间直接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那时，他就象一个重新学习的小学生一样，倾听着人民的肺腑之言，深深体察着存在于群众之中的疑虑和愤懑的情绪，宣传党的真实历史、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每次谈话，最后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来请：“请放心，问题迟早会解决的！”父亲在同群众谈话时，并不避讳一些尖锐的问题。当时他谈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感到的由衷欢迎。他说：“邓小平同志果断，干脆，有能力，乎众望，中央的工作由他主持，得人心。”有时，身旁的子女被他犀利的话语所惊惶，他却克制一点，他却用苍凉有力的声音回答：“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人民群众有什么话不能讲？不怕！”他爱护群众，他也生活在群众的爱护中间。群众拥护他，帮助他，关心他。他们常常对他说：“安老，你要保重身体啊，将来一定还可以为党工作的。”再为党工作，父亲也抱有这样的希望。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答谢善良的淮南人民对他的激励，他在淮南生活期间，时常深刻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自觉地进行着思想深处的修养和砥砺。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同“四人帮”反动力势又要批斗他，但是，遭到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妄图批斗他的人凶恶地说：“这里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思想界限不清，政治上糊涂，安子文这样的反革命，家中居然门庭若市，真该严加管制、惩治！”历史又无情地嘲弄了这班家伙，“ equal 之水之战”的八公山就在淮南市旁边，他们在人民的怒涛面前，

史，已经受到历史的惩罚。最近，中央决定，为1966年以前的中央组织部恢复名誉，为一切受过株连的同志全部平反。中央组织部的真实情况终于大白于天下。

四

父亲回到北京后，接受了新的任务，来到中央党校，又投入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父亲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七点二十分去上班，八点准时开始工作。父亲经常向我们表示，他十多年没有工作了，必须加紧工作，了解和熟悉新老干部的思想情况。晚上和节假日，找他谈话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他在工作之外，又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每天都很紧张而又有些疲劳，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心情是舒畅的。因为他在长期囚禁和管制中朝思夜梦重新为党工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去年3月22日，父亲来到党校和同志们一起植树。他平时总是为自己祖国的大好河山缺少茂密的森林和如茵的草地而遗憾。因此，他的兴致很高。3月来的天气，春寒料峭，他回来后，第二天就病倒了。因长期被监禁、受尽摧残和潜藏在体内的各种疾病总爆发了。先是感冒，接踵而来的是低烧、肝病、肾病，最后又发现了癌症……

父亲躺在病床上，勇敢地接受病魔的挑战。他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说话与活动都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认真准备了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口授了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心得，他还请同志们整理了一篇他纪念刘少奇同志的文章，谈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建党思想的一些体会。在这三篇文稿中，父亲抒发了一个老组织工作者重新工作之后，天天萦绕在心的踌躇。他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写的。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正面临着重新改造自己的任务。”

“我党历史上几次革命转折关头，凡是抓住了重新教育干部这个环节，转移就比较顺利。这次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较之历史上的几次转移，意义更伟大，阻力也更大。”

“我认为，党的十二大在党的建设方面，在修改党章方面，需要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防止林彪、“四人帮”、康生事件重演。二、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真正有能力领导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党。”

（下转第五版）

的言语,又使
好象在重复着
句名言:“人
你们的!你
啊!”

